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第六辑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

张伟 主编

骆雨祥 题



海洋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第六辑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

张 伟 主 编

海洋出版社

201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 第6辑/张伟主编.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5027 - 8724 - 0

I. ①浙… II. ①张… III. ①海洋 - 文化 - 浙江省 - 文集

②沿海经济 - 经济发展 - 浙江省 - 文集 IV. ①P722. 6 - 53②F127. 5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4122 号

责任编辑:赵 武

责任印制: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7.5

字数:440 千字 定价:60.00 元

发行部:62132549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编委会

主 任： 郑孟状

主 编： 张 伟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桂云 李加林 严小军 张 伟 郑孟状

郑曙光 胡求光 段汉武 钟昌标 蔡先凤

前 言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性刊物。本刊物旨在围绕本中心的浙江海洋经济与管理、浙江海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区域社会变迁、浙江海洋文化三个研究方向,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努力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基础性与对策性研究成果,在促进基地建设、推动学术交流的同时,为浙江省全面实施海洋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智力服务。

本辑共收录论文31篇,其中除了中心研究人员的部分研究成果外,也有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研究人员的相关成果。就其内容而言,涉及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以及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方面,既有宏观研究,也有个案研究;既有理论、对策类研究,也有基础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相关海洋文化、海洋经济研究,尤其是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的一些新动态。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编纂时间仓促,文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同行专家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编委会
2013年4月

目次

近年博多港研究的新动向——以中国人居住区的形成为中心	
..... [日]山内晋次撰 李广志译(1)	
政策改革与政治本性——以中国与塞内加尔海洋渔业为例	
..... [比]费拉罗·吉安鲁卡 玛琳·布兰斯 白斌(9)	
欧洲海滨旅游的起源与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法]杜鹏飞 沈世伟 任小丽(25)
古代椒江海洋诗歌的文化学解读	汪文萍 王康艺(33)
海洋民俗文化的一朵奇葩——海峡两岸如意信俗的传播与衍变	邴伟山(39)
建设台州海洋文化的思考	林文毅 卢昌彩(45)
试论东海地区龙王与妈祖信仰影响力的消长	宋珍珍(54)
宋代两浙盐业的生产技术	岳帅(60)
海洋安全与渔业生产——近代浙江海洋护渔制度的变迁	白斌(70)
近代中国海洋渔业转型问题研究	李园园(79)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美洲白银问题研究综述	周莉萍(90)
舟山市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 SWOT 分析	王文洪(96)
国内外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经验分析	韩瑾 葛晓波(102)
中国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	林珏(111)
蓬莱 19-3 油田溢油事故给中国政府的法律教训	蔡先凤(119)
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理性”与“异化”——国家级海洋经济区、“十二五”省(市)	
海洋经济的规划透视	马仁锋 马波 汪玉君 梁贤军(139)
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及形成因素分析——基于 1996—2011 年沿海各省面板	
数据	张冰丹 熊德平(151)
我国金融与海洋经济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	
..... 俞立平 燕小青 赵丙奇(162)	
我国滨海地区入境旅游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李瑞 马子笑 郭娟(171)
金融发展对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何晶 胡求光(180)
浙江省港航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创新研究	崔斐斐 孙伍琴(188)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安全保护	蔡先凤(194)
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建设的金融服务创新	孙伍琴(205)
宁波市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 SWOT 分析	骆嫫 杨丹萍(211)
宁波港口物流发展的评价指标构建——基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左睿(217)
宁波市港口物流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基于 1990—2010 年的数据	高建慧 俞雅乖(227)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休闲渔业发展 SWOT 分析——以宁波市核心区为例	邓启明 朱冬平 张秋芳(236)
宁波海洋产业的评估分析及其发展路径选择	童兰(245)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机制及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宁波的经验	胡求光 童兰(255)
宁波港:加快转型打造国际强港	王军锋(265)
加快海洋旅游人才培养 推动海洋旅游产业发展——以宁波市为例	苏勇军(271)

近年博多港研究的新动向

——以中国人居住区的形成为中心

山内晋次¹ 撰 李广志² 译

(1. 日本神户女子大学 2. 宁波大学)

摘要 唐朝中后期,东亚、东南亚海域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商人在拓展海外贸易的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人居住区。日本博多港,自古以来就成为连接中国与日本的重要窗口。本文通过文献史料和最新的考古资料,考证了11—13世纪中国商人在博多的居住设施以及社会生活情况。文章所介绍的有关博多中国人居住区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研究均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中国海商 博多 中国人居住区 鸿胪馆 唐坊

一、引言

9世纪以后,中国商人开始拓展海外贸易,并逐渐在东亚以及东南亚海域掌握了海上贸易主导权。10世纪后期的宋代,中国国内的商品流通得到巨大发展,海商们的贸易活动更加活跃,他们的活动范围覆盖东起日本列岛,西至东南亚地区的广阔海域,确立了其掌管海上贸易的优越地位。而且,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海商以及搭乘他们贸易船只的各阶层、各工种的中国人,分别在东南亚、朝鲜、日本等国形成了海外中国人居住地^①。本文聚焦11—13世纪日本博多形成的居住区状况,并着重总结近10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日本国际交流史上划时代性的9世纪与博多

如上所述,中国海商于9世纪正式展开贸易活动,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国际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之所以这么说,在此之前,日本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国际交往,基本上是通过日本王权派遣新罗使、遣唐使,以及新罗、渤海等地的王权国家向日本派遣外交使节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在其派遣的时间间隔、参加人员等方面,都受到固定线路的制约。但进入9世纪以后,这些外交使团的相互派遣几乎全部停止下来,而新罗和中国的民间海商,连年驶

^① 关于9世纪以后中国商人拓展的海上贸易,榎本涉在2008年总结了研究概要。关于东南亚、东亚的中国人居住区,参见和田久德的1959年、1961年、1982年,山内晋次的2003:210-213页等研究。

往日本从事贸易活动,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也就是说,9世纪时,国际交流形成了新的路径,交流人员范围扩展到民间人士。据此,可以认为,9世纪在日本国际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性意义^①。10世纪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民间海商贸易活动更加活跃,由此展开了“宋日贸易”^②。

日本与中国大陆海上贸易的最大据点位于博多(现在的福冈县福冈市中心地)一带。博多地处九州岛北岸中心部,它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另外,它面向玄界滩,位于狭窄的博多湾中央地区,对于船舶避风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此外,博多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便捷地连接王权所在地的列岛中部近畿地方和濑户内海。正因为拥有如此众多的地缘优势,博多一带自9世纪以前就成了日本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③。这样,古时国际交流重地的博多,在9世纪以后的海上贸易发展过程中,被日本朝廷批准为中国商船驶入的贸易港^④。结果,博多成为日本古代、中世纪时期最大的贸易城市,迈入了有别于国内其他都市的发展历程。

三、博多的鸿胪馆

7世纪后半叶,日本(倭国)朝廷在博多设置了对外公馆。这一设施,归属负责九州地区行政和外交的政府派出机构(后来的大宰府)管辖,当初称“筑紫馆”。9世纪前期,仿照中国改为“鸿胪馆”。这个鸿胪馆,本来的功能是作为日本派遣外交使节的进出地和迎接朝鲜半岛、中国外交使节的迎宾馆。但是,如上所述,9世纪以后,这种外交使节的往来几乎全部停止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新罗、唐的民间商船大量涌入。这一设施也只好改变其原有机能,主要用于临时接待外国商人,成为朝廷管理海外贸易的设施^⑤。

经考古发掘确定,鸿胪馆位于今福冈市中央区的和平台球场一带。那里古时为博多湾突出的海角台地,鸿胪馆就设置在它的前面。遗憾的是,有关鸿胪馆的史料几乎荡然无存。因此,仅靠文献资料,很难弄清楚其真实状况。但是,1987年以后,经过对鸿胪馆遗址进行连续考古调查,从出土遗物中逐渐呈现出了该设施本来的面目。

现已确定,鸿胪馆遗迹由南北两座建筑群构成,被东西走向的沟渠隔开。遗迹表明,建筑物至少经历了3个时期,即第1期(7世纪后半期)、第2期(8世纪前半期)和第3期(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前半期)。尽管无法更深入地了解该建筑遗迹的具体细节,但从出土的中国陶瓷和瓦等遗物来判断,这一设施在第4期(9世纪后半期至10世纪前半期)和第5期(10世纪后半期至11世纪前半期)中也曾使用过。

① 关于9世纪日本的划时代性,参见山内晋次 2008年、2011;榎本涉 2010b:12-17页。

② 关于9世纪以后日本海上贸易的研究动向,参见榎本涉 2002、2009、2010年;Enomoto 2003;山内晋次 2008a、2008b。

③ 关于这一点,比较新的研究成果见小林茂、矶望、佐伯弘次、高仓洋彰编 1998;バートン 2001;Batten 2006;久住猛雄 2007等。

④ 山内晋次 2003:128-166页。

⑤ 关于鸿胪馆历史变迁的文献资料及考古数据,参见大庭康时 2005、2006、2009年;古代博多展实行委员会编 2007;渡边诚 2010b等。

在鸿胪馆出土的遗物中,令人瞩目的是9世纪后半期以后出土量剧增,以越窑青瓷为主的大量中国陶瓷碎片,远远高于日本同期其他地区的出土量。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中,有些珍贵的器种(茶具、灯具、捏钵等)是日本国内的其他遗迹中未曾发现过的。由于这些器种出土的数量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并不是流通的商品,而是居住在鸿胪馆里的中国商人的日常用品。此外,还发现许多日本其他地区基本没有出土过的粗制陶瓷,以及未出窑的叠烧瓷碗等器物。由此可以断定,这些中国陶瓷,有些是不符合日本国内的需求,有些是作为次品没有进行流通,结果就废弃在鸿胪馆里了。从这些出土的中国陶瓷可以看出,鸿胪馆是在日本朝廷的管理下提供给中国海商居住和从事贸易的场所。

四、贸易据点的转移——从鸿胪馆到博多遗迹群

然而,在鸿胪馆遗址11世纪中期以后的土层中,没有发现其他建筑物的痕迹和遗物。由此可以推定,11世纪中期以后,鸿胪馆已经停止运营。至于为何停止使用,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日本史书《扶桑略记》、《百鍊抄》等永承二年(1047年)十一月条记载,中国海商居住的宿坊发生了火灾(放火)事件。因此可以推测,那场火灾就是废馆的主要原因。但是,史料中多次出现,即使11世纪中叶以后鸿胪馆没再使用,中国海商仍然不断地驶向博多,从事海上贸易。那么,11世纪中期以后的贸易活动,到底是在博多的哪里进行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尚未发现更多的文史资料。然而,能提供最有力证据的仍属考古资料。1977年以后,在鸿胪馆遗迹以东2~3千米的日本铁道株式会社博多站北侧中心地段,连续进行了200余次考古挖掘,结果发现很多建筑遗迹和其他遗物,这些遗迹统称为“博多遗迹群”^①。遗迹群跨越古代和中世,位于东侧沙丘之上,隔海湾与鸿胪馆相望,东侧与内陆相连,而北、南、西侧面向大海和河流,与周围陆地相隔离。

在这个遗迹群的大批发掘成果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海商贸易的实物资料,也就是11世纪后期以来中国陶瓷碎片剧增这一事实。如前所述,鸿胪馆遗迹至11世纪中叶为止,再没有出土过中国陶瓷碎片等遗物。与此相反,博多遗迹群自11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陶瓷碎片数量猛增,其出土量远远高于鸿胪馆遗迹。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从11世纪中叶开始,中国海商居住和贸易的场所,已从鸿胪馆遗迹转向了博多遗迹群一带。

博多遗迹群地区,应该在11世纪中叶以前就设有某种行政机构。关于这一点,尽管没有文献资料记载,但考古发掘显示,这里已具有公共设施特征的大型建筑遗迹和官员专用的服饰用品。因此,可以认为,在日本朝廷的主导下,海商们的居住和贸易场所从鸿胪馆转移到博多遗迹群,而且朝廷仍然对转移后的博多遗迹群地区实施贸易管理^②。

五、博多中国人居住区的形成

在这个博多遗迹群地区,究竟形成了怎样的中国海商居住区和贸易据点?遗憾的是,几

① 关于博多遗迹群及其贸易状况,参见大庭康时 1999, 2011, 2006, 2009b, 2011; 田上勇一郎 2006; 大庭康时、佐伯弘次、菅波正人、田上勇一郎编 2008 等。

② 山内晋次 2003: 128 - 263 页。

乎未见记载其详情的史料。然而,12 世纪前后的一些文献中却称博多中国人居住、贸易区为“唐坊”或“唐房”^①。关于“唐坊”与“唐房”这一称呼,“唐”指唐人,也就是中国人的意思,“坊”指他们居住街区的一部分。另外,“房”还有房屋、住所的意思。因此,史料中的“唐坊”或“唐房”,指的就是中国人居住地或居住设施。如此可以印证,11 世纪后期至 12 世纪,博多已形成中国人居住区。

关于中国人居住区“唐坊”的具体状况,只有通过考古资料才能反映其真实细节。如上述所言,从博多遗迹群中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其出土状况具有以下鲜明特征^②。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与日本同期国内其他遗迹相比,中国陶瓷碎片的出土量极其庞大,并且在出土的陶瓷碎片总量中,进口陶瓷碎片所占的比例极高。

其次,在出土的陶瓷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大型陶瓮、特殊器型的物品等。这些大型容器,很可能是从中国进口某种物品时使用的装箱容器,在博多卸货后遗弃在那里的。

再者,在博多遗迹群中,还发现因火灾等原因遗弃的数百件中国陶器,以及一并被废弃的建筑遗址。根据这些特殊状态的遗物,可以推断中国海商们曾经拥有店铺、仓库等设施。此外还发现 2 000 件以上的中国陶瓷碎片,器物的底部(高台的内侧)墨书有各种各样的文字和记号。其中出现许多写有中国人名,或人名+“纲”字的瓷器。这个“纲”字,在中国代表运输货物的队伍。由此可以断定,中国商人发送货物时,在商品上墨书某种印记,并于博多进行挑选,一些因残次不能出售的就丢弃在那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除博多外,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发现过器物底部带有墨书的中国陶瓷。关于不能出售的商品,博多遗迹群中还屡次出土一些釉药溶解后盖身粘在一起的盒子,以及叠烧在一起的瓷碗等器物。这些陶瓷也是为了销往日本国内,在此区域内挑选后因残次而丢弃的遗物。

另外,在博多遗迹群中,尽管出土量不多,但频频出土一些陶瓷灯具、盅、人形、香炉、水具等生活用品。这些物品是逗留在博多的中国商人及相关中国人士的日常用品,在日本国内的其他遗迹中几乎没有发现过。因此,中国陶瓷的出土状况,除上文所述的众多特征,再结合日本国内其他地区没有类似物品出土这一事实,对于判定博多遗迹群的性质和功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博多遗迹群出土的中国陶瓷量,在 12 世纪中叶达到了顶峰。尽管 13 世纪以后,在数量和器种方面有所减少,但仍是国内出土量最多的地区。通过考古数据可以看出,在 11—13 世纪的日本,博多遗迹群一带是国内唯一一处中国海商的常驻地 and 贸易据点。这一场所,正是上述文献史料中所载的中国人居住区“唐坊”^③。

至于唐坊的准确位置,由于文献记录极其有限,因此,仅靠考古资料推测难度较大。但依据现有的考古数据判断,它位于博多遗迹群西侧,即从现在的栴田神社到冷泉公园一带的可能性极大。此外,在这一区域里,除中国瓷片外,还出土了许多形态及纹样明显不同于日

① 关于博多唐坊的研究动向及新发现的史料,参见山内晋次 2003:230-237 页,2010;榎本涉 2005;渡边诚 2006, 2009。

② 参见大庭康时 1999,2001,2009b,2011。

③ 近年来有学者主张,同一时期博多以外的九州各地也存在唐坊,见服部英雄 2005,2008;柳原敏昭 2011:70-159 页。对此,渡边诚 2006 提出否定意见,双方展开论争。正如山内晋次 2003:128-166 所言,笔者对九州各地有过唐坊的说法持否定意见。

本中世纪的珍奇瓦片。这些瓦片酷似中国南部的瓦片,仍然可以看做是与中国人居留设施有关的遗物。

六、博多的中国人社会

这里,主要依据几部仅存的文献史料,介绍一下居住在博多的中国人社会的一些状况。

从史料来看,自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前期,唐坊是在大宰府的管理下设置的。至于12世纪下半叶以后,因史料的缺失,已无法掌握其与大宰府的关系。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唐坊以及以此为据点的中国海商们,仍然与大宰府政权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方式与过去有所不同^①。

唐坊与权力机构的关系在中国人社会与大宰府等日本官府之间起到中介作用。9世纪到13世纪的史料中,记载着一些停留、居住在博多的有实力的中国人担任“通事”一职之事。在这些事例中,比如“大唐通事”张友信(《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六年八月十三日条),明确是大宰府任命的公职。另外,12世纪末期的李宇(《日吉山王利生记》第7),称作“博多津前通事”。通事头衔,应该属于代代相传的官职。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正是这些拥有“通事”官衔的中国人,在博多中国人社会中统筹运作,同时在日本政府和中国人社会之间起着中介和协调作用^②。

行驶到博多的中国海商及船员,从贸易结束后到归国这段时间,一般在那里停留半年乃至数年。这期间,一些中国人与日本女子之间结合生子。史料中多处记载,这些孩子长大后,也同其父亲一样,从事中日贸易^③。

12—13世纪的史料中,记载一种名为“纲首”的人,他们把贸易据点设在博多,是有实力的中国海商。他们以各种形式与大宰府及博多周边的大神社、寺院、中央政府官员及贵族结成友好关系。其理由是,只有在当权者的保护下,他们才能够顺利地从事贸易活动。同时,作为回报,纲首们承揽了当权者出资的商贸及相关业务^④。

另外,在纲首之中,一些人凭借财力在博多建造寺院。博多现存的圣福寺和承天寺等,就属这类寺院。纲首们从事的佛教事业,不仅在博多,而且也向中国寺院大批捐赠。除此之外,这些中国海商们也为无数的日本僧人入宋、入元,以及宋、元僧侣访日等提供了航海便利。当然,海商们给僧侣提供便利的原因,也有出自经营上的战略考虑,目的是为了同他们的贸易保护者,也就是与寺院这样的重要客户保持良好关系。不过也有因海商们出于对佛教的纯粹信仰,才做出如此举动^⑤。这样,以纲首为代表的中国海商,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

① 渡边诚 2010a:248 页。

② 山内晋次 2003:260 页。

③ 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见山崎觉士 2011。

④ 参见林文理 1998;榎本涉 2006,2007,2010c;渡边诚 2010a 等。

⑤ 山内晋次 2003:237-244 页。

扮演了重要角色^①。

13 世纪中期以后,史料中再没有出现过博多中国人居住区的相关内容。“纲首”一词,也于 1253 年之后不见了。其原因,有学者推测,由于 1274 年和 1281 年元朝两次进攻日本,致使博多的唐坊走向衰退。但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在 13 世纪后半期以后的宋、元贸易中,博多仍然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据点。然而,为什么博多的唐坊和纲首在文献史料中消失的问题,有待于今后继续研究^②。

七、结语

总之,本文介绍的 11—13 世纪期间博多中国人居住区“唐坊”的有关资料,它不仅对于日本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在亚洲乃至世界史研究方面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上所述,随着宋代中国海商贸易的发展和扩大,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海域,形成了中国人居住地,日本博多的唐坊亦属于这类居住地。但是,关于亚洲各地中国人居住地形成的证明材料,只现于中国史料中。也就是说,关于那些居住地的记录,只保留在中国一方。相反,几乎见不到当地人记录的中国人居住地存在的史料。虽然后来当地的记录有所增多,但仍然可以说,几乎没有像 11—13 世纪这样早期的当地记录。在文献记录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居住地博多一方存有部分早期史料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其重要价值所在。而且,大量的博多遗迹群考古数据,远远胜出文献资料,更加说明其意义之重大。

另外,有关博多的日本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于今后比较研究亚洲各贸易港的外国人居住地问题,包括中国泉州、广州等国际贸易港中以穆斯林海商为中心的外国人居住地“蕃坊”等,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材料。

参考文献

- [1] 榎本涉:《日本史研究における南宋・元代》,《史滴》24,2002 年。
- [2] 榎本涉:《《荣西入唐縁起》からみた博多》,五味文彦編《中世都市研究 11 交流・物流・越境》,新人物往来社,2005 年。
- [3] 榎本涉:《宋代市舶市貿易にたずさわる人々》,歴史研究会編《シリーズ港町の世界史 3 港町に生きる》,青木書店,2006 年。
- [4] 榎本涉:《宋代の〈日本商人〉の再検討》,《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 - 九 ~ 十四世紀》,吉川弘文館,2007 年。
- [5] 榎本涉:《中国人の海上進出と海上帝国としての中国》,桃木至朗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岩波書店,2008 年。
- [6] 榎本涉:《解説 日宋貿易》,新編森克己著作集編委員会編《新編森克己著作集 2 続日宋貿易の研究》,新編森克己著作集編委員会編,2010 年。

① 有关海商与佛教、僧侣和寺院等的密切关系,榎本涉 2010b 做过历时性的、综合性的论述。此外,尽管不属于海商与佛教关系的主题,但手岛崇裕 2010 年研究中,从平安时期日本对外关系史与佛教史的统合角度,对日本佛教史做过研究史整理。

② 另外,《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二年(870 年)二月 20 条等有所记载,很可能是博多唐坊的前史资料。关于居住在大宰府管辖内的新罗商人的动向,今后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点,参见郑淳一 2010 等。

- 究》,勉誠出版,2009年。
- [7] 榎本渉:《日宋交流史研究》,遠藤隆俊他編《日本宋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1980年代以降を中心に——》,汲古書院,2010a年。
 - [8] 榎本渉:《講談社選書メチエ 469 選書中世史4 僧侶と海商たちの東シナ海》,講談社,2010b年。
 - [9] 榎本渉:《東シナ海の宋海商》,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日本の対外関係3 交通・通商圏の拡大》吉川弘文館,2010c年。
 - [10] Enomoto Wataru. 2003. “Updates on Song History Studies in Japan: The History of Japan – Song Relations,” *Journal of Song – Yuan Studies* 33.
 - [11] 大庭康時:《集散地遺跡としての博多》,《日本史研究》448,1999年。
 - [12] 大庭康時:《博多綱首の時代 – 考古資料から見た住蕃貿易と博多》,《歴史学研究》756,2001年。
 - [13] 大庭康時:《鴻臚館》,上原真人他編《列島の古代史:ひと・もの・こと4 人と物の移動》,岩波書店,2005年。
 - [14] 大庭康時:《博多の都市空間と中国人の住居》,歴史学編集会編《シリーズ港町の世界史2 港町のトポグラフィ》,青木書店,2006年。
 - [15] 大庭康時:《大宰府鴻臚館・博多》,新編森克己著作集編委員会編《新編森克己著作集2 続日宋貿易の研究》,勉誠出版,2009a年。
 - [16] 大庭康時:《シリーズ遺跡を学ぶ:61 日本中世最大の貿易都市 博多》,新泉社,2009b年。
 - [17] 大庭康時:《国際都市博多》,川岡勉・古賀信幸編《日本中世の西国社会3 西国の文化と外交》,清文堂出版,2011年。
 - [18] 大庭康時・佐伯弘次・菅波正人・田上勇一郎編:《中世都市・博多を掘る》,海島社,2008年。
 - [19] 古代の博多展示実行委員会編:《鴻臚館遺跡発掘20周年記念特別展 古代の博多 鴻臚館とその時代》,福岡市博物館,2007年。
 - [20] 久住猛雄:《〈博多湾貿易〉の成立と解体》,《考古学研究》53-4,2007年。
 - [21] 小林茂・磯望・佐伯弘次・高倉洋彰編:《福岡平野の古環境と遺跡立地 – 環境としての遺跡との共存のために》,九州大学出版,1998年。
 - [22] 田上勇一郎:《発掘調査から中世都市博多》,《市史研究ふくおか》1,2006年。
 - [23] 鄭淳一:《新羅海賊事件からみた交流と共存 – 大宰府管内居住の新羅人の動向を手がかりとして –》,《立命館大学コリア研究センター次世代研究者フォーラム論文集》3,2006年。
 - [24] 手島崇裕:《平安時代の対外関係史と仏教 – 入唐僧・入宋僧研究から見た現状と課題 –》,《中国 – 社会と文化 –》25,2010年。
 - [25] パートン,ブルース:《NHKブックス922 国境の誕生 大宰府から見た日本の原型》,日本放送協会,2001年。
 - [26] Batten, Bruce L. 2006. *Gateway to Japan: Hakata in War and Peace, 500 – 1300*.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27] 服部英雄:《日宋貿易の実態 – 〈諸国〉に到着の異客たちと、チャイナタウン〈唐房〉 –》,《東アジアと日本 – 交流と変容》2(九州大学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人文科学),2005年。
 - [28] 服部英雄:《宗像大官司と日宋貿易》,九州史学研究会編《境界からみた内と外》,岩田書院,2008年。
 - [29] 林文理:《博多綱首の歴史的位置 – 博多における権門貿易 –》,大阪大学文学部日本史研究室編《古代中世の社会と国家》,清文堂出版,1998年。
 - [30] 柳原敏明:《中世日本の周縁と東アジア》,吉川弘文館,2011年。
 - [31] 山内晋次:《奈良平安期の日本とアジア》,吉川弘文館,2003年。
 - [32] 山内晋次:《日本列島と海域世界》,桃木至朗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岩波書店,2008a年。

- [33] 山内晋次:《解説 森克己の研究の意義と問題点》,新編森克己著作集編委員会編《新編森克己著作集1 新訂日宋貿易の研究》,勉誠出版,2008b年。
- [34] 山内晋次:《《香要抄》の宋海商史料をめぐって》,《アジア遊学》132(東アジアを結ぶモノ・場),2010年。
- [35] 山内晋次:《九世紀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の変貌－日本遣唐使関係資料を中心に－》,古代学協会編《仁明朝史の研究－承和転換期とその周辺－》,思文閣出版,2011年。
- [36] 山崎覚士:《海商とその妻－十一世紀中国の沿海地域と東アジア海域交易－》,《仏教大学歴史学部論集》1,2011年。
- [37] 渡邊誠:《大宰府の〈唐坊〉と地名の〈トウボウ〉》,《史学研究》251,2006年。
- [38] 渡邊誠:《年紀制と中国海商－平安時代貿易管理制度再考－》,《歴史学研究》856,2009年。
- [39] 渡邊誠:《十二世紀の日宋貿易と山門・八幡・院御厩》,入間田宣夫編《兵たちの時代Ⅱ 兵たちの生活文化》,高志書院,2010a年。
- [40] 渡邊誠:《鴻臚館の盛衰》,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日本の対外関係3 交通・通商圏の拡大》,吉川弘文館,2010b年。
- [41] 和田久徳:《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初期華僑社会(960-1279)》,《東洋学報》42-1,1959年。
- [42] 和田久徳:《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成立》,筑摩書房編集部編《世界の歴史13 南アジア世界の展開》,筑摩書房,1961年。
- [43] 和田久徳:《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元朝商船の活躍と中国人社会の展開》,稲・舟・祭刊行世話人編《稲・舟・祭－松本信廣先生追悼論文集－》,六興出版,1982年。

政策改革与政治本性

——以中国与塞内加尔海洋渔业为例

费拉罗·吉安鲁卡¹ 玛琳·布兰斯¹ 白斌²

(1. 比利时鲁汶大学 2. 宁波大学)

摘要 多层次的规则规范着渔业管理:国际协议、国家法律、授权立法和行政区域法案。所有层次中,政策决定应该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中生态问题所需要考虑的内容。自1990年代以来,众多国际协议有完整的科学性信息,促使其向更负责任的渔业管理转变。相比之下,国家(地区)的政策决定不能仅仅是基于知识,还需要为了被视为合法和避免冲突去回应政治、管理和社会经济行为等相关事件。本文通过渔业政策改革中突出显示各种行为的角色,分析伴随着向可持续渔业政策过渡的政治不确定性。为了这个目的,本文追踪了中国和塞内加尔在国际协议中影响渔业政策形成与实施的主要矛盾。

关键词 政治 渔业政策 中国 塞内加尔 冲突

寻找解决问题需要发现的不仅是那些措施被认为是技术上能够解决或纠正的一个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将其落实到位的可能性或可行性(Howlett & Ramesh 2003: 143 - 144)。

一、引言

关于科学与政治在国际制度中的作用,Arild Underdal(2000)认为,一些制度安排(如国际机制)“比其他方法更有能力解决特殊的难题”(Underdal 2000:1),因为它们能更好地应对两个主要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知识:制度必须能够理解问题和产生足够的回应(制度的过渡能力);第二个挑战是政治:能够调动各因素解决方案(制度的政治能力)。因此,Underdal(2000)认为,制度的成功,即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把知识转化为可行的决策(Underdal 2000:2)。

相关的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对话也强调国家公共政策。根据 Rotmans 和 Van Hasselt (1996:331 - 332)的研究,科学家们提供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所依据的可信的和可能的信息。另一方面,决策者和社会利益相关者决定基本利益中什么是合法和合适的,以及社会经济组织中的价值存在。政策不只是来源于知识,还需要考虑一些重要因素的支持。

1990年以来,许多国际协议整合科学信息,向可持续发展逐步过渡,并在特定的渔业领域,向更负责任的管理转变。这种转变清晰地体现在已经解决了发生在沿海国家管辖权和

专属经济区 (EEZ) 内海域所有类型渔业的四个全球协议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1982, 1994) 关注的焦点是通过引入专属经济区 (EEZ) 分配和利用渔业资源。《21 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1992 年通过) 代表海洋资源向可持续开发利用与保护转变, 这种对可持续性的关注随后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CCRF, 1995) 和《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JPOI) 所确认 (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2002 年通过) (Freestone, Barnes and Ong 2006)。

关于我们上面提到的科学与政治的对话, 如果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可以感觉到“科学霸权”, 如同一些作者所争论的 (如 Blok 2008: 39; Underdal 2000: 6), 这些国际协议的履行全部展示出政治特性。通过对中国和塞内加尔国家渔业体制的研究表明, 实际上, 政治复杂性表现在环绕渔业政策及其在新的国际承诺下的改革。

在解释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后, 论文分析了国际义务履行中冲突的产生和国家政策所暗含的转变。之后, 本文试图勾勒一些全国性的注意事项和政策制定进化的一般意义。最后, 结论部分强调和重新确立科学和政治的互补角色。

二、理论框架

国际协议旨在使国家政府及其角色行为有助于在紧要关头解决问题 (Jacobson & Brown Weiss 2000: 1; Keohane et al. 1993: 8; Stokke et al. 1999: 91)。Bernstein 和 Cashore (2000) 强调通过国际协议, 国家政策逐渐扩张 (国际化), 国内法规和实践朝符合国际惯例的“拉对遵守 (pull towards compliance)”方向转变。不过, 只要中央政府愿意并能够将国际义务整合到国家立法中并确保其应用和执行 (Cicin-Sain et al. 2006: 36), 国际制度也可以影响国家政策的发展和变化。因此, 国际承诺在国内的实现就变得极其重要 (Young 1999: 273-279)。

国际机制在国内实施的过程很少为研究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所关注, 只有近期一些研究 (Brown Weiss & Jacobson 1998/2000; Underdal & Hanf 2000; Victor, Raustiala, & Skolnikoff 1998) 指出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内因素, 如国家支持和管理能力。欧洲研究更多的是国际义务的履行。

欧盟/欧共体的政策实施被解释为欧盟直接对成员国渗透和影响的过程 (Héritier 2001; Radaelli 2003), 这可能引发成员国的制度转型和政策变化 (Featherstone 2003; Haverland 2003)。欧盟要求和国家实践中制度水平的不兼容性导致各成员国适应强度 (或“适应压力”) 的不同。高适应压力 (High adaptational pressure) 将面临决定国家改革能力的国家因素逐步的反对 (Risse, Cowles and Caporaso 2001)。

诸如适应压力和改革能力, 用有效性的概念来解释履行在某种程度上被政策研究证实。类似于 Goggin, Bowmann 和 Lester (1990) 研究的在美国联邦层面的授权决定, 可以证明“消息”源自延伸到国家层面的国际协议。这里, 履行取决于国家的改革能力, 即建立在国家一级的政治以及在州一级的能力 (也就是说资源) (Goggin et al. 1990)。关注消息 (或者更广泛的说, 政策设计)、政治 (如冲突的舞台), 以及能力 (或资源的需求) 可以追溯到其他关于履行的研究 (例如 Winter 2003), 这些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政策变化和改革的研究中, 如 Grin-